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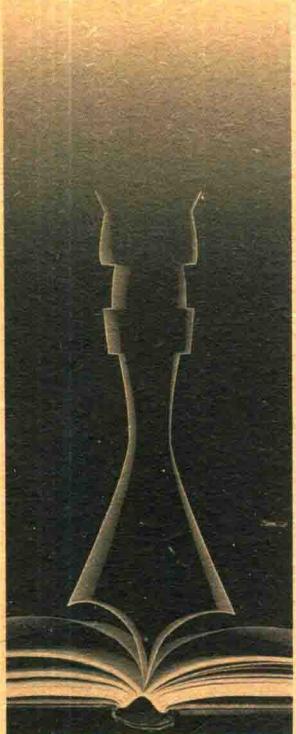
教科书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石鸥

艰难的规整

——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中小学教科书研究

方成智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艰 难 的 规 整

——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中小学教科书研究

方成智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艰难的规整——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中小学教科书研究/方成智著。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 - 7 - 5648 - 1413 - 7

I. ①艰… II. ①方… III. ①中小学—教材建设—研究—中国—1949—1966
IV. ①G632.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4780 号



教科书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石鸥

艰难的规整——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中小学教科书研究

方成智 著

策划组稿 | 赵亚梅

责任编辑 | 蒋旭东 晏燕平

责任校对 | 王旭中

出版发行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853867 88872751

传真：0731. 88872636

网址：<http://press.hunnu.edu.cn>

经 销 |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 15 插页 8

字 数 | 237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978 - 7 - 5648 - 1413 - 7

定 价 | 45.0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序

与高头讲章、学术典籍相比，孩童们手捧的小课本似乎是最微不足道的了；与研究国家的宏观教育战略及纯学理体系的构建相比，对这些小课本的研究似乎也是最微不足道的了。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一切学术精华与思想光芒，只有被一代代年轻人吸收同化进而创新，才有可能学术长存，思想长春，而要让它们成为年轻人成长的营养，需要化为简单浅显的内容溶入课本，才可能融于心灵。一切教育战略的实施和各种教育学派的主张，最终必须进入学校，进入课堂才有价值与意义，而进入学校、进入课堂的途径主要是这些小课本。任课程理念多么先进，任教育思想多么进步，唯有转化为课本才可能起应有作用；任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如何清晰，任民族素养的提升需求多么急迫，也唯有借助课本才能得以不同程度的实现。

历史地看，中国自洋务运动一百多年来，从西式教科书的引进，到学堂自编教科书发轫，从书坊教科书之兴盛，到官编教科书的出现，从通用教科书的一统，到教科书的百花齐放，小小课本开民智启民德，传承着民族的光荣与梦想，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撒播着现代文明之光，它们启迪心灵，形塑国民，激荡着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特别是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在“盗贼夜行，军阀逐鹿”的民国年间，多处乡镇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为什么？纵然是兵荒马乱，却有人心淡定。这又是为什么？有人说，这是因为上有信念、下有常识，而集二者于一身的乃小小课本；这是因为“民间社会的许多路口站着有严肃的先生、学童，手中握着课本”（邓康延语）。这就是教科书的力量。

曲折微妙的是，在中国文化下，教科书开创并主导中小学的局面在20世纪后半个世纪愈加真实、持久并且极端，功利化色彩日益



浓厚。教师的优劣以学生对教科书的掌握为标准，教育的质量以考核学生掌握教科书的情况为依据，家长对孩子的督促也是手捧着教科书来检验。我国的文化传统导致了学校课堂上教师教的是教科书，学生学的是教科书，考试考的是教科书——从古至今，从古代科举到现代学校概莫能外。教科书在我国中小学几乎就是教育的圣经。中小学的课堂文化几乎就是教科书的文化。我曾经说过，一定程度上指挥中国中小学教育的不是教育部，而是编撰教科书的那些人。他们指挥着学生学习什么接受什么，他们告诉学生认同什么否定什么。他们让整个中小学课堂随教科书的定调起舞。

遗憾的是，长时期里，对于这些小小的于个人于民族都意义非凡的教科书，我们的学术界特别是经典学院派的学术几乎对其不屑一顾。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新中国以后著名学者亲自实质性操持教科书的现象越来越少，二是对教科书的真正研究非常匮乏。课本圈（姑且这么称谓）往往是自说自话，基层实践工作者看重教科书的教与学，教科书提供者看重课本的编撰与发行，唯独缺乏极为重要的对教科书的批评或评论。最重要的文本，竟然缺乏最需要的关注。

教科书如此重要，而我们却无法科学回答教科书中究竟是否应该编入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否可以删掉《狼牙山五壮士》；面对充满争议的鲁迅的作品哪些以及多少甚至是否应该进入教科书，我们莫衷一是；对教科书究竟是否应该或如何体现国家意志，当国家意志与客观真理冲突时教科书应如何处置等问题，我们充满困惑；对教科书如何体现特色，教科书发展进程中统一与多样、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之间如何权衡人们普遍不解……无法回答是因为缺乏研究，莫衷一是也是因为缺乏研究，充满困惑还是因为缺乏研究，普遍不解更是因为缺乏研究。

别无解决之途，唯有加强研究。我们太需要研究了，需要教科书批评或评论。

此时，俯看自身，回望历史，廓清历史就是一种研究。19世纪下半叶始，有了新式学堂，也有了新式教科书。一百年来，中国的教科书发展走出了一条值得大书特书之路，这条道路之艰辛、之曲折、之困顿，需要梳理，需要总结，更需要反思。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我们提出，清末民初教科书发展有一个绝无仅有的黄金时期，那么，这与紧接着的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局面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大事件、大人物、大著作、大思想固然重要，小课本引进新思想、新行为、新价值观的作用也不能轻视。它们为大人物的新思想、



为大事件带来的大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觉醒的民众基础——清末民初的海量教科书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最草根的一次重要的民主政治启蒙、现代伦理启蒙、科学文明启蒙运动，这场启蒙运动自下而上展开，为推进中国的近现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在一定意义上，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之所以相对比较容易攻破延续千百年的封建皇朝，是由于这场启蒙；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的理念之所以很快就成为广大学生积极追求的理想，胡适、鲁迅、陈独秀的思想之所以被广大青年普遍认同，都是由于这场启蒙。

教科书研究不仅要回望过去，更重要的是检视当下，启迪未来。今日，当我们痛陈教科书问题多多，批判教科书远离儿童，脱离生活之时，我们能否从那些历史久远的教科书和已经成为过去的早期教科书制度中获得些许启示？为什么百年前鲜活的教科书至今天成为教条、说教、枯燥、死气沉沉的时代名词？当年张之洞、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章士钊、冯友兰、吕思勉、顾颉刚、林语堂、竺可桢、严济慈、丁文江、刘海粟等亲自甚至独立编撰教科书的局面何时才能再现？是否值得呼唤再现？确实，历史与现实有着惊人的统一，一百年后，我们仍然要不停地追问：中小学教科书如何体现科学、民主、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与追求？如何利用教科书这一最大读者群的文本对未成年人进行有效思想引领？如何通过教科书给广大青少年儿童以及他们的家长带来更多的正能量？这些一脉相承的现实问题，我们也许可以从历史这面镜子中得以昭示和折射。

教科书研究还要探寻本真。历史永远纷繁复杂，现实总是变幻莫测，这尤其需要加强对教科书本真问题的探究。比如：教科书有哪些构成要素，教科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教科书的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是什么样的，如何编写既体现一般文化要求和知识水准、又能够满足不同发展水平的学生需要的教科书，社会（国家）、学科、学生三要素在教科书编写中的地位与价值，教科书选择内容的依据以及教科书内容的更新和改编，教科书的竞争、选用和淘汰制度等主题的研究。

该套丛书即是我领衔的教科书研究团队在教科书研究的上述方面所做的些许努力和尝试。这些研究风格不一，主题不一，但都是围绕教科书而展开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学科的也有制度的。它们或从教科书历史维度来展开，如对清末民国、对新中国十七年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教科书的历时性、阶段性研究；或从现实角度展开研究，如教科书内容取舍过程中的各种权力博弈，教科书对思想的形塑和规训等；或围绕学科教科书展开研究，



如对英语、对体育、对思想品德等教科书的梳理与研究；或从制度维度来研究，如教科书的审定。但都试图通过实物澄清史实，通过历史昭示现实，通过各个点的深挖来实现面的通透，通过教科书的外在表现来把握其深层实质，通过教科书这面镜子来透视教育发展、折射孩子们的成长。其中有些研究即便粗糙，应该说还是填补空白的；有些研究的结论即便还值得商榷，但某些方面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比如对清末民国教科书的审定制度研究，其文献梳理工作相当扎实，至少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文献基础。所有研究都体现了一个突出特点，即大量占有教科书实物。我们主张，在教科书研究上，不读课本不动笔，至少慎动笔，犹如文学评论要读文学作品、电影评论要看电影一样。我很庆幸，研究教科书我们有一种天然优势，这就是大量占有历代教科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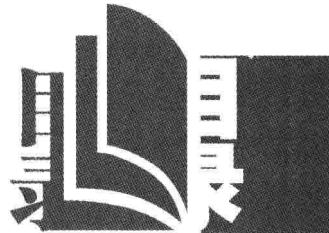
该套丛书与其说是某个人的研究成就，不如说是我们教科书研究团队集体智慧的结晶；与其说是教科书研究团队近年的研究成绩，不如说是十多年潜心搜集、整理、分类、研究的成果积累（其中多数是毕业多年的博士对自己论文的修改稿）；与其说是研究的结果展示，不如说是我们团队有关教科书研究的新的、深度的开始。

该套丛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没有周玉波先生、陈宏平先生的眼光与气度，没有李培超先生、黄林先生、何海龙先生、曹爱莲女士的认真审读以及各种宝贵意见，没有赵亚梅女士的策划组稿及文字加工等辛勤劳动，就不可能有这套书的面世，由衷地谢谢各位。说真的，我欣赏并信赖用心在做我们的书的出版社。

该套丛书的出版还要感谢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感谢孟繁华教授，感谢宁虹、康丽颖、蔡春、张增田教授，感谢关心我的各位同事。感谢你们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平台。

本丛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教育学课题“百年中国教科书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基础作用”（BAA120011）阶段性成果。

石鸥
于首都师范大学 学堂书斋
2013年8月25日



001 第一章 规整的缘起：新中国 新秩序 新教育

002 第一节 规整教科书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

003 一、教科书：维持政权合法化的主渠道

006 二、教科书：传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媒介

008 三、教科书：维持社会稳定的有效武器

009 第二节 规整教科书是教育自身发展的需求

009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的落后状况

011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教科书的混乱与无序状态

026 第三节 规整教科书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使然

026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确定

027 二、教科书全国统一供应方针的确定

030 第二章 规整的策略：从模仿借鉴到自主探索

031 第一节 依靠统一的政体来规整

031 一、统一的前提与基础

034 二、统一的具体措施

042 三、统一过程中的特点

044 第二节 仿效苏联的模式规整

044 一、学习苏联浪潮的兴起

046 二、效法苏联的方式方法

056 三、照搬苏联模式的后果

057 第三节 借鉴延安的经验规整



057	一、延安经验回归的背景
060	二、借鉴延安的具体做法
068	三、规整的特色
072	第四节 提高质量的名义规整
072	一、注重质量的缘由
075	二、提高质量的路径
085	三、规整的效果
091	第三章 规整中的博弈：各种力量的角逐
091	第一节 除旧布新，新中国教育与旧教育遗留的博弈
092	一、学制变革中的反反复复
097	二、课程设置及教科书内容选择中的“兴无灭资”
110	第二节 延安经验、民国经验与苏联经验的相互冲突
110	一、延安经验、民国经验、苏联经验简析
116	二、本土经验与苏联经验的碰撞
138	三、延安经验与民国经验的冲突
155	第四章 规整的反思：意义、问题及启示
156	第一节 教科书规整的意义
156	一、有利于国民共同价值观的树立
157	二、形成了优秀的编辑团队，提高了教科书质量
160	三、规范了教科书市场，利国利民
161	第二节 教科书规整的问题
161	一、导致了教科书的垄断
164	二、强调“政治挂帅”，忽视人性需求
169	三、规整依据的不确定，导致规整的动荡
172	第三节 对当前教科书规整的启示
172	一、规整不等于垄断
175	二、规整重在制度建设
183	结语
186	参考文献
202	附录
225	后记



第一章 规整的缘起：新中国 新秩序 新教育

教科书常常很明确地尝试去创建一个新文化世界。

——阿普尔《教科书政治学》

194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10月1日，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与以往社会性质截然不同的新时代。“人民中国，屹立东亚。光芒万丈，辐射寰空。艰难缔造庆成功，五星红旗遍地红。生者众，物产丰，工农长作主人翁。使我光荣祖国，稳步走向大同。”^①这是郭沫若为给新中国献礼于1949年10月3日在《天津新生晚报》上发表的诗歌《新华颂》。1949年11月，敏于感受时代脉搏的诗人胡风以他饱满的激情写下了《时间开始了》一组长诗，热情洋溢地歌颂了新中国的开始。1949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副刊“人民文艺”用半个版面刊登胡风的组诗《时间开始了》的第一乐章《欢乐颂》，全诗400余行。胡风的诗歌发表后反响很大，不久被翻译成俄文，同年12月30日出版了单行本，“惊住了一切人”。对于新政权的领袖，他写出了这样的句子：毛泽东/一个新生的赤子/一个初恋的少女/一个呼兄的难主/一个开荒的始祖……对于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盛大场面，他兴奋地描述道：海！/欢呼的海！/歌唱的海！/舞蹈的海！/闪耀的海！/从一切方向流来的海！/向一切方向流去的海！/劳动着，战斗着，创造着/从过去流来的海/劳动着，战斗着，创造着/向未来流去的海！^②在胡风的笔下，新时代的宏大气势澎湃而来，胜利的喜悦、欢腾的情绪飞扬着，仿佛一曲慷慨激昂的交响乐，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胡风的这组长诗代表了一

① 赵雪章.解放——城市记忆 [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247.

② 傅国涌.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标本档案 [J].青年作家.2008 (09).



个时代的期望，被誉为“开国之绝唱”。

新的国家必然带来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巨大改变：政治上，基本解放了全国大陆，建立了统一的人民民主政权，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颁布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经济上，没收了官僚资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以宏观调控为主要机制的、以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意识形态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胜利，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广为流传，以“除旧布新”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迅速开展，新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急需灌输给人民大众。面对这些由于新中国建立所带来的种种变化，新的政府必然要求学校教科书迅速作出反应，以迅速改变人们的思想，实现新社会的整合。也就是说，在新中国摆脱了国外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压迫，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发展时期，对中小学教科书进行规整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第一节 规整教科书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

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旧政权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在新政权诞生之初，新旧两种势力的搏杀非常激烈。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各地散留的职业特务有 7 700 余人，国民党和三青团成员达 650 余万名，土匪 40 多万，封建会道门 27 种，拥有道徒 1 360 余万，地主 200 万。^①不管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也不管是在新解放区还是在老解放区，新生的人民政权都遇到了土匪武装、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会道门等封建迷信组织的破坏。1950 年 1 月至 10 月，全国共发生以颠覆新生人民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武装暴乱 816 起。^②

^① 徐汉民. 人民治安 40 年 [M]. 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10.

^② 中国公安史稿编写小组. 中国公安史稿 [M]. 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256.



敌特分子把共产党高级干部、爱国民主人士和国民党起义将领作为暗杀目标，基层干部遭匪特暗害的情况也十分严重。仅1950年春季到夏季，被反革命杀害的县、区、乡干部达4万多人。^①

为此，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新生政权。除了军事打击、坚决开展镇压各种反革命活动的运动，迅速恢复经济秩序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文化、教育等领域进行改造和重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培养广大民众对新生政权的认同和忠诚，而这种认同则主要通过学校教育特别是教科书对特定思想的灌输来完成，可以说，教科书是培养社会认同感的主要工具。正如陆费逵先生所说：“立国的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②

正因为如此，所以任何政府，尤其是新生政权都会采取种种措施来规范和统整教科书，以赢得公众的认同。

一、教科书：维持政权合法化的主渠道

1. 政权合法性与认同

任何政权的存在都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合法性主要关心的问题是统治、政府或政权怎样及能否在社会成员的心理认同的基础上进行有效运行。即如何使政治统治取信于民。“合法性形成了治权的基础，是法治体制中开展政治活动的基础。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而且是不言而喻和必需的。”^③由此可见，合法性被看作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同时，这个合法性不可能一劳永逸。如何维护和加强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政权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问题，否则，政权就会出现危机。

那什么是合法性呢？合法性源于拉丁语 *legitimare*，即“宣称合法”，最初含义指国王有权即位是因为他们的“合法”出身。广义的理解，合法性就是

① 中国人民公安史稿编写小组. 中国人民公安史稿 [M]. 北京: 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7: 257.

② 宋元放. 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3卷)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159.

③ [法] 让-马克·思古德. 什么是政治的合法性 [J]. 王雪梅, 译. 外国法译评, 1997 (2): 18.



统治者的正统性和正当性。合法性的英文是 *legitimacy*，意指“拥有为普遍的行为标准所承认的正当理由状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合法性”的释义是：“它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不是来自正式的法律和法令，而是来自由有关规范所判定的、‘下属’据以给予积极支持的社会认可和‘适当性’。”^①注意：这里“法”是指公认的规则，与电脑术语“非法操作”的“法”的含义相同，不是指的当局的法律条文。“如果某一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种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正因为当公民和精英人物都相信权威的合法性时要使人们遵守法规就容易得多，所以事实上所有的政府，甚至最野蛮、最专制的政府，都试图让公民相信，他们应当服从政治法规，而且当权者可以合法地运用强制手段来实施这些法规。”^②可见，合法性意味着对一种政治秩序的认同，它涉及的是在政治权力中的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的内在关系，一个政权取得合法性，就意味着社会成员对政权体系的高度心理认同和行为服从的自觉发生，也就意味着该政权的统治权力被认可。

何谓“认同”（*identification*）？在现代汉语中，认同有两种含义：一是认为跟自己有共同之处而感到亲切；另一是承认、认可。^③如果根据“认”和“同”含义的复合来说，“认同”还有赞同、同意的意思，其义与承认有相似之处。显然，只有那些美的、善的、正义的事物、事件、行为等才可能获得公众的认可、赞同和承认。

认同也是建构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认同是社会行为主体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形成的一种自我认知。认同不仅是一种心理层面的自我感受，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它关系到我们是谁，我们归属何处，谁是我

^① [英]戴维·米勒，韦农·博格丹诺.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大百科全书 [M]. 邓正来，等，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10.

^② 白钢. 论政治的合法性原理 [J]. 天津社会科学，2002（4）：42—51.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150.



们的同类，谁在我们团体之中，谁又被排除在这个团体之外。”^①

2. 教科书与认同培养

如前所述，合法性是一个政权乃至社会稳定的基础，而合法化的前提是认同，那么，一个政权要怎样才能得到人民大众的广泛认可、赞同、忠诚和服从呢？

一般而言，作为执政党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培养、建构一个社会的认同体系。比如：掌握国家机器（军队和警察），提高执政绩效（政治民主化程度、社会公正的实现程度），拥有文化领导权（令人信服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具有良好的经济绩效等。其中令人信服的理论和意识形态是建构社会认同的核心手段，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其政治体系要维护其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认同和维持稳定的政治秩序，首先要使其意识形态得以建立并得到国民的接受，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整合政治力量凝聚社会成员的功能。意识形态构筑起一个政权体系合法性基础的根基。正如意大利的葛兰西所说，统治集团主要依靠说服、教育等意识形态一致化的途径来实现对从属集团的精神和道德领导。^② 而德国的哈贝马斯也曾指出，社会文化系统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在社会文化系统中，人们在自发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社会整合，这样，人们在日常交往中就会获得一种群体认同，这种群体认同就是对一种政治秩序的认同，这是社会文化获得充分发展的结果。公民文化获得充分发展后，将自然地为政治秩序保持一种忠诚的信念。因此，哈贝马斯认为政治合法性只能从社会文化系统中去寻找。社会文化系统的发展，使得一套普遍有效的价值规范得以确立，从而保证了一种有效的群体认同，进而政治权力在民众中取得一种广泛的信仰、忠诚和支持。^③

诚然，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紧密相关，政治认同可以通过文化认同来实现，而文化认同的培养则主要依赖于学校教育。因此，学校教育就成了培养

^① Chris Farrands, “Society, Modernity and Social Change: Approaches to 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Edited by Jill Krause and Neil Renwick, *Identit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6, p. 1.

^② 何增科. 市民社会与文化领导权：葛兰西的理论 [J].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08）.

^③ 马宝成. 试论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 [J]. 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2000（02）.



政治认同的必由之路。因为：

第一，学校以教学为中心，学生以学为主。学生的成长阶段主要在学校度过。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其自身的长治久安，都会严格控制学校，长年累月地将渗透了其主流意识形态的教科书，按部就班地教给学生。

第二，学校遵循教育教学的规律，在促进学生发展的同时，传授统治阶级的思想，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认同，无须用高压、暴力的手段迫使学生接受。

第三，学生本身具有很大的可塑性。这也使得教育、灌输成为可能。

可见，学校教育对于政权合法化意义非凡，而作为在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最具体的传递工具——教科书，能为政治权力合法性提供最有效的证明和支持，它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政权合法化的主要渠道。

二、教科书：传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媒介

1. 意识形态的发展及内涵

每个社会都有意识形态，作为形成“大众想法”或共识的基础，而社会中大多数人通常都看不见它。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个词是由法国哲学家德·特拉西于1796年在其著作《意识形态原理》一书中首先提出并使用的，被用来界定一种“观念的科学”。原意系指建构知识的合理理论，因而含有正面而积极的科学探究意义。但后来在言语的使用上，“意识形态”经常被赋予负面的价值判断，表现出负面的意涵。直到知识社会学的出现，人们才开始以比较中立、客观的态度来看待意识形态。

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意识形态是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指反映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它是该社会的精神标志。”^①

^① 张小虎. 中国20世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更迭与语文教育 [D]. 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2: 4.



2. 教科书塑造人们（尤其是年青人）的意识形态

任何国家为了本身政权的稳定与发展，都要在其政权体制内传播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教导下一代服从国家所设定的信仰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随着革命的胜利，过去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形式更多地表现为新旧价值观念的对立与冲突，思想斗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新战场。为巩固新政权，加速社会变革的完成，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重构新的意识形态，用以指导和统一人们的思想，以解决转型时期价值冲突和思想混乱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庄严宣告：“中国人民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为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新的文化教育方针：“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①因此，宣传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确立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重构意识形态的主旋律。

要真正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以社会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思想阵地，除了利用广播、电台、报纸等媒体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说服之外，学校教育也被视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强有力的工具。

阿图舍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中，认为教育（学校）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②认为学校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国家机构”，它借助于提供政治社会化，而成为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手段。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统一教科书，把国家倡导的、允许的价值理念、意识形态渗透在教科书中，通过教科书的发行及课堂教学中的具体应用，使广大的青少年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进而在全社会范围内逐步推行其价值理念，以促进社会、个人和国家的政治话语的一致。

① 瞿葆奎主编. 教育学文集·中国教育改革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3-4.

② 薛毅. 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1卷）[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60.



三、教科书：维持社会稳定的有力武器

1. 教科书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

教育是促进人的社会化的过程。著名社会学者涂尔干在 1956 年时曾指出，教育的目标在于发展儿童身体的、知识的及道德的能力，使其能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一方面，教科书通过传承主流社会的行为规范及价值标准，协助儿童社会化，使儿童接受并形成社会所期望的一整套行为准则，使他们能顺利地融入社会群体中，并以此来规范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这样人人都照章办事，整个社会就井然有序了。另一方面，教科书提供了个人对社会国家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是促进社会安定团结的基础。另外，学校教育及课程具有分化功能，不同的工作与生活所需要的课程是不一样的。学校的课程、教科书通过提供一些必要的知识使学生能顺利地从事某种职业生活。换言之，学校通过对学生实施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教育，把学生分配到不同的职业层次的不同岗位上，并促使他们安于积极工作现状。因此，就社会结构功能论的观点，认为教育具有正面的生产功能，教科书是维持社会团结安定的重要手段。^①

2. 教科书能更好地维持阶级的利益

教育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于政治社会化。所谓政治社会化是指“社会成员在政治实践活动中逐步获取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的过程”。^② 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是社会意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③ 从历史上看，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都会将其认可的价值理念和规范等当做是正确的、合理的、合法的知识写进教科书里，让学生接受并内化。一般来说，社会、学校、教师、学生及家长都视教科书为理所当然的存在，很少对教科书中的知识加以怀疑。这样，通过学校教育，下一代就习得了社会的基本的政治态度、规

① 蓝顺德. 教科书政策与制度 [M].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06: 8.

② 吴琦等. 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69.

③ <http://baike.baidu.com/view/79764.htm>.